

## ※學人介紹※

# 我的漢學生涯回顧

——馬悅然教授東華大學演講錄

馬悅然著 車行健譯\*

### 【譯者前言】

馬悅然(N. G. D. Malmqvist)教授，1924年6月6日出生於瑞典，受業於當代漢學大師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9)。馬教授不但繼承高氏嚴謹紮實的治學方法，復致力譯介當代中國文學作品於西方。目前除擔任瑞典學院、瑞典皇家科學院及瑞典皇家人文科學院院士之外，還榮任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審委員。馬教授於1998年10月25日應邀至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進行專題演講，本文乃根據馬教授親自撰寫的演講稿翻譯而成。馬教授在這篇文章中對他一生的學術活動做了簡略的回顧，同時也對他的學術成就做了自我評價。目前用中文評介馬教授學術成就的文章尚不多見<sup>①</sup>，因此馬教授這篇帶有學術自傳意味的演講稿就更加彌足珍貴，不但是了解馬氏本人的第一手文獻，也是認識本世紀歐洲漢學演變的寶貴史料，值得吾人重視。

此篇演講稿原題為“Reflections by a Retired European Sinologist”，中文譯名為譯者所改。原文並無章節區分，也沒加章節標題，譯文的章節區分、章節標題及註解均為譯者所加。

---

\* 東華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① 王家鳳、李光真所撰之《當西方遇見東方》(臺北：光華畫報雜誌社，1991年初版)一書有專章對馬氏介紹，不過較偏重一般性的報導。此外張靜河亦有〈馬悅然的漢學建樹〉一文(載於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2集，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7年)，張氏此文對馬氏的學術成就做了較全面的介紹，對馬氏學術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取來與本文參照。

## 一、開場白

這場演講的主題也許會令在座的許多人感到新奇，但是當我思量我可以在東華大學講些什麼內容時，我突然警覺到我是屬於一個與今日截然不同的環境中所訓練出來的學術世代，而這個世代在漢學這個領域內正急遽地消失中。這個領悟使我得以把關注的焦點擺在本世紀漢學內各領域所發生的許多鉅大變化，因此我決定在這場演講中對我個人所直接和間接經歷的這些變化做一番概觀，同時也對我的貢獻做一些簡短的評價。一個學者會用這種方式來談論他的作品，多少會讓在座的某些人感到奇怪，但你們也都將會同意：客觀評價的能力是一個學者所不能不具備的。我堅定地相信一位學者是能夠全然無私且客觀地看待自己的作品，並且判斷他的東西什麼是優秀的，什麼是好的，什麼又是不足的。

## 二、從高本漢談起

先讓我說一下我的老師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9)，以及他如何涉入中國研究的過程吧！1909 年秋天，當高本漢在烏普薩拉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Uppsala) 修習完北歐語 (包含瑞典語、丹麥語、挪威語及冰島語)、斯拉夫語及希臘語的課程，獲得學士學位後，他又到聖彼得堡花兩個月的時間跟隨早幾年被聘來擔任中文課程的伊凡諾夫 (A. I. Ivanov, 1878-1937) 學習。隔年二月，高氏便乘船東渡到上海。

在船上的兩個月裏，高本漢通讀了當時最好的漢語導引讀物之一，由 Calvin Mateer (1836-1908) 所編寫的《中國話讀本》(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s, 2nd ed 1906)。在接下來的兩年裏，高本漢待在山西的太原，在那兒，他遊遍了整個華北，並且調查了不下 33 種方言。檢視高氏當時從中國寄回家鄉的書信可以發現，高氏那時並沒有對中國文化產生特別的興趣。他來中國的主要目的是進行方言的田野調查。他在這段並不算長的時間內所蒐集到的方言材料，成爲他日後重建古代漢語的資料來源。

當高本漢於 1911 年 12 月從中國歸來後，他花了幾個月時間待在倫敦的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 研讀。不久他決定前往巴黎，因爲當時兩位偉大的漢學家沙畹

(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和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都仍活躍於此。在這裏，我想稍稍岔出去對當時執歐洲漢學研究牛耳的巴黎漢學說幾句話。我這樣做的理由是因爲高本漢旅居巴黎的這段時間，對他本人以及間接的對他的門生皆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在 1912 至 1914 年間，高本漢就讀於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在那裏，沙畹擔任漢學講座，而伯希和擔任中亞語言及歷史講座。當時沙畹講授儒家經典《書經》、《詩經》和《春秋》，以及它們在作爲史學研究的資料中所具有的地位等課程。他也選擇了劉向的《列女傳》做爲訓讀 (explication de texte) 課程的教材。

數年前剛從中亞及敦煌遺穴探險歸來的伯希和在當時進行了三場系列演講：其一是蒙古帝國的組織，其二則是關於蒙元時期用漢文及突厥文所寫的雙語碑文，其三則是古代至十五世紀末中亞基督教的擴張。在 1912 至 1914 年間，當時的高等專門研究學校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歷史與語文學部並沒有任何講演活動，而於 1913 年接替沙畹擔任宗教學部主任的是其弟子葛蘭言 (Marcel Granet, 1884-1941)。葛氏曾於 1913 至 1914 年間在法蘭西學院講授「宗教的聖水儀式」(Les rites de l'eau)。葛氏原初想要根據《儀禮》講授貴族婚禮的課程，但這個課程卻取消了，因爲有資格修習這門課程的惟一學生已到河內去從事研究了。

大家可能會疑惑我爲何沒有提到法國漢學家馬伯樂 (Henri Maspero, 1883-1945)。馬伯樂於 1911 年被任命爲河內的法蘭西遠東學院中文部主任，馬氏在那裏進行了諸如漢傳佛教、泰語音韻及安南史等不同領域的研究。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許多法國殖民地軍隊中擔任通譯。那時他應已進行〈唐代長安方言考〉("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EFEO 20, 1920) 那篇大作，該篇論文部分根據的材料和高本漢據以重建古代漢語的材料相同。

只有很少的學生參加沙畹和伯希和的課程，他們講授的課題都和他們自己的研究相關。在法蘭西學院和高等研究專門學校都沒有基本語言的教學，這和我們的時代，世界各地絕大部分的中文系學生都會被要求在他們進入到研究階段之前，先要花好幾年的時間去接受集中的語言訓練的情況大不相同。當時的學生必須自己想辦法去尋求學術資源。

1913 年，高本漢在一封從巴黎寫給其未婚妻的信中抱怨道，他爲了一本研究所需的書無法在巴黎找到，只得被迫到倫敦或萊登 (Leiden) 的圖書館去尋找。我不知道他是否確曾到倫敦或萊登去找那本書，但是如果他真的如此做，而且也真的

找到他所需的書，他也只能用手抄的方式去複製，因為在當時並沒有其他的複製設備可以供他使用。在今天這個時代，研究工作者很難想像，在本世紀初缺乏館際的借書制度，對學者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更別提缺乏已出版的圖書目錄、索引、辭彙引得、大辭典（如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資料庫、影印機、傳真機、網際網路及電子郵件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況。

早年的教育方式是，教授從各種可能的角度，帶領著學生對文本加以訓讀。高本漢遊學巴黎期間就是跟隨沙畹用這種方式訓讀的，後來他本人也沿用著這套教學方式，並且也為他的門生所繼承下來。

### 三、追隨高本漢

現在再回到我本人吧。在 1940 年代中期，我在瑞典烏普撒拉大學主修古典語文。當時我的人生目標是當一位高中的拉丁語和希臘語的教師。我利用閒暇的時間閱讀中國哲學的著作，特別是道家經典《老子》和《莊子》的譯作。當我讀了《老子》的英、法、德文三種譯本後，我發現很難令人置信這三種譯本都是來自同樣原來的文本。到了 1946 年春天，我終於鼓起勇氣打了通電話給當時正擔任斯德哥爾摩遠東博物館館長的高本漢，詢問他我是否可以去看他，他親切地答應了。幾天之後，我見到了他。我向他請教究竟那種譯本是最好的，他回答我說那些譯本都一樣糟糕。「只有一種《老子》的譯本是好的。」他說道。「那就是我譯的本子！」於是他借給我他那本尚未出版的譯本。一個星期之後，我將譯本歸還給他時，高教授就問我為何不乾脆直接學中文，當下我就決定這麼做了。1946 年秋初，我告別了烏普薩拉和我的古典研究來到了斯德哥爾摩，正式忝列高氏門牆。

我清楚記得 1946 年秋天初次跟隨高本漢訓讀的經驗。當時我對古漢語惟一所知的只是古漢語是單音節的，而且每一個音節字都是由一個獨特的記號標識著。分發給課堂上五、六位學生的文章選自《左傳》，當高本漢讀到文章的一個段落時，我就計算他所念的音節數，然後就在文章同樣數目的方塊字旁畫個小記號。不久之後我就注意到，某些特定的字常常直接出現在我畫的記號之前。透過高本漢的解說，我了解到漢語所具有的語尾綴詞不但可以標示不同句型類別，有時候也具有情態的功能。慢慢地，高本漢對文章的音韻和語法結構的解說，對字形的分析，以及對文章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的闡述對我們這些學生而言，比任何古漢語教本所能給我

們的都還多得多。對還只是初學者的我們來說，甚至已有實際站在第一線研究的感覺。

對高本漢而言，中國歷史中的近代時期 (modern period) 是始於後漢。他在講課當中大部分選用的教本都是先秦作品，偶而也講授些南北朝及唐、宋時期的文章。當他的學生詢問爲何不讀些更近代的漢語文本時，高本漢便選擇了一本晚明小說——《好逑傳》。我們極爲皮毛的漢語口語知識是透過閱讀高本漢的《北京地區的普通話讀音》(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 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on the Pronunciation) 一書而得來的，此書是高本漢在 1918 年被任命爲古騰堡大學 (Gothenburg University) 漢學講座之後所出版的。

自然地高本漢也會講授他在構擬上古和中古漢語時所使用的方法論，這使得他的學生對古代漢語音韻的理論能力要遠優於他們現代漢語口語的實際使用能力。當我在 1948 年夏天初次來到中國時，我甚至連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說，然而我卻能輕易地閱讀經典作品，並且也能夠將我在閱讀先秦典籍中所遇到的許多字詞指稱出它們在上古漢語音韻中所歸屬的聲韻類。

在 1946 至 1948 年間待在高本漢課堂上的學生們有易家樂 (Søren Egerod，後來擔任哥本哈根大學 [Copenhagen University] 漢學教授)、韓恆樂 (Henry Henne，後來擔任挪威奧斯陸大學 [Oslo University] 漢學教授)、畢漢思 (Hans Bielenstein，起初先任教於坎培拉澳洲國立大學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in Canberra]，後來轉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執教)、Aulis Yoki (後來擔任芬蘭赫爾辛基大學 [Helsinki University] 芬蘭—烏戈爾語 [Fenno-Ugrian] 教授)、安德森 (Bertil Anderson，後來擔任烏普薩拉大學漢學講座)、卜斯文 (Sven Broman，曾擔任斯德哥爾摩民族學博物館館長一職)。在經過我們不斷地遊說之後，高本漢終於同意爲我們開一門漢學書目課程。他簡單地列出約數十名西方漢學家的名字，並且對我們念道：「沙畹，不錯！沙畹是偉大的學者，就讀沙畹的東西！」「來比錫的 August Conrady (他曾在 1915 年擔任高本漢的博士論文考試委員)，好！讀他！」「伯希和，仔細地讀他的東西，還有不要忘了他的注解，他的注解往往比正文更重要！」「你們可以在圖書館找到書目上的書！」

當學生向高本漢請教如何在研究上有所進步時，他對他們所提出的忠告就是：「讀書！讀書！再讀書！」我後來也把這個忠告提供給我自己的學生。獲得對文本「感悟」的惟一方法就是坐在那兒不斷地讀。剛開始的時候，進度會很慢，而且必

須在字典中（如《漢文典》，*Grammata Serica Recensa*）翻查許多生字，但是不久之後，就可以抓到對文本結構、韻律及風格的感覺。任何對拉丁文稍有訓練的學者都可以一眼就分辨出某一篇文章的特殊段落是由 Caesar、Tacitus 或 Livius 所寫。同樣地，分辨《孟子》、《左傳》和《莊子》的差異也是可能的。

#### 四、中國方言調查與漢語語言學的研究

1948 年夏天，我和易家樂、畢漢思、韓恆樂、安德森、卜斯文來到中國。我們當中有五個都曾獲得洛克菲勒獎學金的贊助來中國進行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以及到柏克萊跟隨趙元任做一年的研究。高本漢決定叫我去四川調查方言，因為那裏的方言他從來不曾調查過。我在重慶和成都待了兩個月，學會了西南官話之後，便來到四川的佛教聖地——峨嵋山，在山腳的報國寺住了八個月。以此為基地，我常遊歷到鄰近各縣去研究當地的次方言（sub-dialects）。我紀錄方言所採用的工具符號是由曾教授高本漢斯拉夫語的龍代爾（J. A. Lundell）教授所設計的瑞典方言注音字母，高本漢本人也曾用此來調查中國的方言。我同時也使用美國的錄音機來紀錄大量的口語文獻。

報國寺的住持是位博學的人，每天早晨他為我上兩小時的課。我們先從讀《四書》開始，然後是詩選，範圍從漢魏南北朝的五言詩、樂府到《唐詩三百首》、宋詞和元散曲。直到 1949 年秋天，我移居成都之後，才又繼續成都方言的研究。在那裏我聘用了一位才華洋溢的年輕教師，我跟他讀了《水滸傳》和早期的白話小說。

隨著政局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成都在 1949 年末、1950 年初之際被紅軍占領了，直到 1950 年七月我才不得不離開中國。回到瑞典之後，我將我的方言調查部分成果提出去當做學位資格考試的論文。那時我感到在語言學領域內缺乏紮實的基礎。（一位有識之士曾經告訴我說，一個人若想要致身於語言學研究的話，就必須對他自己使用的語言有堅實的理論能力。但我並沒有達到此要求，我對拉丁文和希臘文所具備的語文學基礎離開當代語言學學科太遠，以致於對我在漢語音韻和語法方面的研究絲毫幫不了什麼忙。）我在烏普薩拉大學擔任中文講師的一年，以及在倫敦的亞非學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任講師的三年之間（1953-1955），主要致力於語言學的研究，尤其是集中在美國結構主義的布龍菲爾

德學派 (the Bloomfield school) 以及哥本哈根的葉爾姆斯列夫的語基學派 (the Hjelmslev school of glossematics) ②。在 1956 至 1958 年間，我擔任北京的瑞典駐華大使館的文化參贊一職。從學術的觀點來看，那三年的時間是沒什麼收穫的。

直到 1959 年，我被坎培拉國立澳洲大學任命為高級講師，兩年後，又被任命為中文系系主任一職，至此我才又重新開始漢學研究的工作。

在 1960 年代初期，我寫了好幾篇關於四川方言音韻和語法方面的論文，如〈四川方言造句結構的限制形式〉(“The Syntax of Bound Forms in Sich’uanese”, *BMFEA* 33, 1961) 以及〈西部官話音韻研究〉(“Studies in Western Mandarin Phonology”, *BMFEA* 34, 1962)。音韻學的論文包括了對成都、樂山和峨嵋方言的共時和歷時的研究，提供了直到那時尚未被認識到的特徵的某些觀察。其中一項探討的是在音節中發音力量的不同分佈，這制約了音調調型 (tone contours)，也就是說，逐漸增強的音量和升調及逐漸減弱的音量和降調之間的相互關係。此外，我也觀察到在某一方言中的聲音轉變始於音位鏈的互動，最後會導致在鄰近方言中不會發生的音位重組現象。在〈四川方言造句結構的限制形式〉一文中我提供了被視為標準西南官話的成都話語法相當全面的說明。對一個以官話為母語的人來說，他會覺得北京話和成都話的語法系統非常接近，但經過仔細的考察後，卻顯示二者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特別是動詞句法、後加成分（語尾助詞）和情態的表述等方面。這篇論文可以被視為開路先鋒之作，因為大多數較早時期的漢語方言研究都仍集中於發音和音韻特

② glossematics 有人譯為「語符學」，不過中央大學的岑溢成教授將之譯為「語基學」，並做如下的解釋：由 Hjelmslev 所建立的 glossematics 基本上肯定 de Saussure 建立語言學的方向，以「語言形式」作為語言理論的基本對象，亦即以探討「語言形式」內部的「同」與「異」為主要任務。所謂「語基」(glosseme) 就是最小的語言形式，也是語言理論分析語言的基本單位，即不可化約的常項。Hjelmslev 為強調這種語言學不同於傳統的語言學，故稱之為「語基學」(glossematics，此詞的希臘語根為 gloss，原為「語言」的意思)。由此可見，「語基學」討論的不在於「語言如何如何」，而是「語言『學』該如何如何」；所以，與其說它是一種「語言理論」，不如說它是一種「後設的語言理論」或「語言學理論」。Hjelmslev 認為一套理想的語言理論，應該建立在經驗主義的原理上，形成一個可以描述語言的純粹演繹的系統。在現代邏輯的影響下，他更主張這種語言理論可以產生一種「算法」(calculus)，可以演算出語言所有的可能組合。這就形成了他的「語基學」的進一步發展。（岑教授對 glossematics 的譯名及說明均只見於與譯者的私人通信，未曾公開發表，譯者引用岑教授的說明時會稍加刪節，若有理解不周或斷章取義之處，文責均由譯者承擔，謹聲明於此，並向岑教授深致謝忱。）

徵的描述方面。（有趣的是，西南官話中的許多語法特徵亦皆曾出現在巴金的作品中，尤其是在他的《家》、《春》、《秋》三部曲中。）

我的有關於漢語音調發音中的漸強和漸弱特徵的理論對研究上古漢語音韻也一樣有用，我在 1962 年所發表的兩篇論文已指出這點（〈漢代音韻及校勘學〉 [“Han Phonology and Textual Criticism”, Canberra, 1962]、〈論上古漢語的  $\text{ər}$  和  $\text{əd}$ 〉 [“On Archaic Chinese  $\text{ər}$  and  $\text{əd}$ ”, *BMFEA* 34, 1962]）。當我在 1950 年代末及 1960 年代初致力於處理音韻學中共時和歷時問題的同時，我的主要興趣已轉到上古漢語語法的領域。這門學科的情況回顧起來令人難過：甲柏連孜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在 1881 年所編寫的《漢文經緯》 (*Chinesische Grammatik*) 仍是此領域中的主要西方著作。中國在過去五十年間確實產生了许多古典漢語語法的著作，但是其中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由於作者的關係——未能區分不同歷時層次的語言材料。在他們的著作中，我們發現他們可以上至《書經》，下至唐宋古文家的文章中任意的選取例證說明。同樣的批評也大致可以加諸於劉淇的《助字辨略》(1711) 和較為現代的楊樹達的《詞詮》(1928) 之上。Dobson 的《漢語助詞詞典》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Particles*, 1974) 主要是摘錄了之前的中國辭書，僅提供了少許新的見解。即使只處理更有限時代（如早期古漢語和晚期古漢語）的作品的語法，我們所發現的例子也是從不同語料來源（如《左傳》和《莊子》）中所汲取出的。

就我的觀點而言，古漢語語法最佳的中文著作是楊伯峻的《文言語法》(1956) 和劉景農的《漢語文言語法》(1958)，周法高的《中國古代語法》(1959-1962) 則包含了大量的材料，最好的漢語歷史語法是王力的《漢語史稿》(1957-1958)。

Dobson 的《晚期古漢語》 (*Late Archaic Chinese*) 我認為完全不可信賴，並且一點都不敏銳。這激發了我去寫一篇高度批判性的書評（〈對《晚期古漢語》語法的某些看法〉， [“Some Observations on a Grammar of Late Archaic Chinese”, *TP*, 48, 1960]）。後來我常常對我的批判使用過分惡毒詞句懷抱著強烈的悔意。缺乏學術水準的作品當然應該受到嚴厲的批判，但評論者應該避免單獨地針對受評著作的作者作攻擊。

寫作一部全面性的古典漢語語法的時機也許尚未成熟，畢竟我們目前所需要的是針對個別典籍的語法（如《莊子》語法、《左傳》語法），我們也需要針對個別文法特徵的專門論著。在這些大量研究的基礎上，未來也許就可以編纂一部真正全



面性的漢語歷史語法。

一些著名的學者確實已經出版了若干關於個別語法特徵的優秀論著，如牟理 (J. L. M. Mullie) 的〈釋「之」〉 (“Le mot-particule TCHE”, *TP* 36, 1942)、Walter Simon 的〈論語尾助詞「矣」之意涵〉 (“Die Bedeutung des Finalpartikel yi”, *MSOS* 37, 1934)、金守拙 (George Kennedy) 的〈助詞「焉」之研究〉 (“A Study of the Particle YEN”, *JAOS*, 1940)、A. C. Graham 的〈釋「乎」〉 (“The final particle fu”, *BSOAS* 17, 1955)、〈論「與」和「矣」之關係〉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final particles ‘yu’ and ‘yee’”, *BSOAS* 19, 1957)、〈古漢語語法的某些基本問題〉 (“Some Basic Problems of Classical Chinese Syntax”, *AM* 15, 1969)、〈墨辯語法〉 (“A Grammar of the Mohist Dialectical Chapters”, in *A Symposium on Chinese Grammar*, 1971)、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北京, 1942) 以及 Christoph Harbsmeier 的《古代漢語構句法面面觀》(*Aspects of Classical Chinese Syntax*, 1981)。

## 五、《春秋繁露》的翻譯及《公羊傳》 與《穀梁傳》的研究

從 1958 年底我離開北京的瑞典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職務起，直到 1979 年春天這段期間，我一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不受歡迎人物。部分原因是因為我曾發表幾篇批評中共農業政策的文章，部分則是歸因於我那身為化學教授的岳父在 1957 年被誤打入右派，二十二年之後才獲平反。在此二十二年間，我不被允許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也無法在那裏從事田野調查工作。1965 年，我從坎培拉回到斯德哥爾摩之後，我被要求撰寫瑞典及斯堪地那維亞關於世界文學、宗教與歷史的手冊，這件工作使我獲得雙重的報酬，除了得到相當豐厚的酬金之外，我也開闊了視野。此外我也寫了一些有關漢語音韻、語法、詩歌和書目的教科書來給斯德哥爾摩大學我所執教的系上學生使用。

在 1965 年離開坎培拉之前，我因為某些奇怪的理由而對被視為由西漢學者董仲舒所撰著的《春秋繁露》產生興趣。我開始著手翻譯這部著作，但很快的便了解到必須先對《春秋繁露》據以所本的《公羊傳》做徹底的研究不可。

如果當時我就清楚自己在做些什麼的話，那我會馬上停下來。因為對《公羊

傳》的鑽研使我又一頭栽入對《穀梁傳》的研究。這兩部傳注皆共同具備某些特點，從而使它們和其他早期的典籍有所不同。如二者都使用了問答體的表達方式，又如爲了達到最精簡的表達，二者皆採取了嚴格公式化的文風以及過度講求詞語的功能變異。此外，這兩部書也運用特定詞語來表示高度專門的意義。這些文本上的特徵使得它們極易被誤解和誤譯，特別是在脫離文脈徵引的情況下。富蘭閣 (Otto Franke) 的《孔教哲學史與中國國教之研究》(*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konfuzianischen Dogmas und der chinesischen Staatsreligion*, Hamburg, 1920) 是西方對《公羊傳》主要的研究，然而因爲引用了許多對《公羊傳》的錯誤譯文而失色不少。

從語法的觀點來看，這兩部書令人感興趣之處在於它們的句法結構反映了一種發展的過渡階段，並且也顯示出其句法特徵明顯徘徊於先秦與漢代之間。同樣有趣的是《公羊傳》的文風強烈影響了漢代的著作。

這兩部傳注皆致力於確認及解釋《春秋經》作者據說用來表達褒貶的術語和書法。今天很少學者會接受《春秋經》所提供的這套判準理論，但我們得記住：漢代只有極少數的學者才不會相信這套說法。這兩部典籍在中華帝國早期的知識生活中曾經扮演了極爲重要的角色，對公羊學派和穀梁學派之間相衝突的理論做徹底的認識無疑地是理解漢代思想的必要條件。當多年之後我思及花了那麼多心血在這兩部看似與我們當代毫不相干的傳注作品時，這個信念多少帶給我一些安慰。

我的〈公羊傳與穀梁傳研究〉(“*Studies on the Gongyang and Guliang Commentaries*”) 共分三次刊登 (*BMFEA* 43, 1971, *BMFEA* 47, 1975, and *BMFEA* 50, 1978)。首先登出的內容包含了對這兩部書的主要部分所作的譯注。後兩次所刊出的內容我討論了：(1) 統計上的判準：這來自於將《公》、《穀》二傳在解釋《春秋經》文時，對有出現解釋和未加以解釋之處作成圖表說明。(2) 音韻上的判準：這來自於對二部傳文中所出現的專有名詞的所有異文加以比較研究。(3) 風格上的判準：這來自於對二傳格套化表達的結構所做的比較研究。(4) 語法上的判準：這來自於對這兩部書語法結構所進行的全面分析。

研究的結果使我確信這兩部書皆根基於口述的傳本，它們皆是成書於戰國末年，而且《穀梁傳》的編定者曾接觸過《公羊傳》。

當我致力於《公》、《穀》二傳時，我仍持續進行《春秋繁露》的譯注，這個工作完成於 1970 年代末期。稿子目前正擱在我書房的抽屜內，而且無疑地也將一

直如此，永遠不會出版。我堅信只有被視做是《春秋繁露》本文的一小部分才是漢代的作品，這部著作的主要部分可能是南北朝後期的偽作。可以發現《春秋繁露》的編纂者依據了東漢班固（西元 32-92 年）的《白虎通》以及何休（卒於西元 182 年）的《公羊解詁》。《春秋繁露》並未被南北朝初、中葉任何處理公羊學的理論的著作所引用，倒是在南北朝後期的注疏中常可發現徵引「董子」、「董子曰」之處，然而這些所徵引的文句卻不見於今日的《春秋繁露》。在《春秋繁露》文本中確實有許多與時代不符之處。我沒有出版《春秋繁露》譯本的理由是我要同時解說《淮南子》及其他編纂書中出現的相似段落，而那項工作會非常地花時間。

## 六、中國現代文學的譯介

1979 年十月我加入了一個計畫，這使我在整個八〇年代用掉了大部分的零散時間，然而環境卻迫使我接受擔任此大規模國際性計畫的協調者之職務。這個計畫是由歐洲科學基金會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發起的，準備完成四大卷的《中國文學選介：1900-1949》( *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該書已於 1988 至 1990 年間出版)。來自於歐洲十一個國家及澳洲、加拿大、香港、中國大陸及美國等地，超過上百名學者參與該計畫。米列娜 (Milena Dolezelová) 教授與 David Pollard 教授在首二卷（小說與短篇小說）的編譯成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卷三和卷四則分別處理詩歌和戲劇。協調這個計畫的工作是非常吃力不討好的，有時候我會懷疑：這個計畫的成果是否抵得過投擲在其中的時間和精力。然而每當我陷入懷疑時，就想到許多中國作家會因他們沒有完全被遺忘，以及他們的著作在西方世界獲得承認而感到極大的欣慰。此外我也堅信來自世界各地參與該計畫的年輕漢學家都因與老一輩的學者合作而受益良多。

## 七、做為翻譯家的漢學家

在歐美及其他地方仍有些心胸狹隘的漢學家們不把翻譯當回事看，他們堅持學者應全心全意投入在研究工作上，不應浪費時間翻譯文學作品。捷克的普實克教授 (Jaroslav Prusek) 就曾強烈地辯駁道：同時致力於文學研究與翻譯皆能對彼此有利。他在 1970 年出版的《中國歷史與文學》(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 一

書的序言中曾寫道：

做為一個通則，一部作品的翻譯會讓我對作者及作品產生更深層的興趣，並且會提出某些會讓我去尋求解答的問題。我同樣也發現，當惟有一個人將外國文學作品翻譯出來，而且對其美學結構和風格具有親密而確實的感觸之後，他才能講出一些較有內涵的東西。

我記得初讀到這段話時感到十分驚奇，但在長期將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我的母語的經驗中，卻讓我體會到這段話確實是妥當的。

普實克教授致力於翻譯工作並不只是想要對文學作品做更深入的鑽研而已，他更抱持著中國文學（不論是用文言、早期白話或現代白話所寫就的）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且應該被如此看待這樣的一個強烈信念。我十分確信普實克教授也會同意我的觀點：對一位有能力駕馭漢語的學者而言，花些時間在翻譯上是他應盡的義務，這可以使他的同胞對於給予他許多美感愉悅的文學傑作，也能得到一些起碼的享受。如此做的話，學者／翻譯者就可以既為他的祖國，也為中國提供有價值的貢獻。然而不幸的是，仍然有許多學術單位中的人拒絕讓翻譯作品當做任職或升等的主要資格作品。這也是事實：翻譯工作照例報酬很低，從而許多學者不能花太多寶貴時間和精力在其中。

自 1960 年代中期開始，我就已經將大量的（一共四十多冊）中國文學作品（既有上古、中古與近代的，也有當代的）翻譯成瑞典文，明年秋天我還會出版一本收錄九家臺灣詩人（紀弦、洛夫、余光中、痲弦、商禽、羅門、羅青、楊牧及夏雨）的翻譯選集。

## 八、對自我的評價：

在這場演講中我盡可能地用最真誠的方式將我自己呈現給各位。如果要我簡要地對自己的學術特色做一番評估的話，我會說我是一個博而不精的人（Jack-of-all-trades）。我的著作曾在許多不同的領域發表，包括方言學、語音學與現代漢語音韻學、歷史音韻學、現代漢語語法、早期白話語法、古代漢語語法、唐詩、宋詞、語義學，還有比較特別的是文言和早期口語中的情態表達、中國文學、歷史與宗教。我對我研究中的某些成果還感到頗為滿意，這包括《公羊傳》、《穀梁傳》的研究、情態表達的研究，以及宋詞格律的內部重建之研究等，其他的則多屬老生常

談。

如果我當初選擇不分散興趣在這麼廣泛的領域，那麼我就有可能完成《左傳》的譯注以及一部全面的《左傳》語法。無疑地那會是我現在全部所完成的著作都加在一起還更重要的成果，但往事已矣，也沒有懊悔的必要！

### 【附錄】引述期刊簡寫對照表

AM	<i>Asia Major</i>
BEFEO	<i>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l'Extreme Orient</i>
BMFEA	<i>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i>
BSOAS	<i>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i>
JAOS	<i>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i>
MSOS	<i>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i>
TP	<i>T'oung Pao</i>

### 馬悅然教授著作目錄

- “A Note on two Szech’uanese Dialects”,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ed. by Else Glahn & Søren Egerod, Copenhagen, 1959, pp. 92-97.
- “Some Observations on a Grammar of Late Archaic Chinese”, *T’oung Pao* 48 (1960), pp. 252-286.
- “On a Recent Study of Han Phonology”, *T’oung Pao* 49 (1961), pp. 94-205.
- “The Syntax of Bound Forms in Sīch’ua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MFEA), (Stockholm) 33 (1961), pp. 125-199.
-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Canberra, 1962.
- Han Phonology and Textual Criticism*,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entre of Oriental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s No 1, Canberra, 1963.
- “On Archaic Chinese -er and -ed”, *BMFEA* 34 (1962), pp. 107-120;
- “Studies in Western Mandarin Phonology”, *BMFEA* 34 (1962), pp. 129-192.
- “Correlated Features of Tone and Stress”, Proceedings,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ssociation*, 1964.
- “On Literary Dialects during the Han Period”, Proceedings,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ssociation*, 1964.
- “Chou Tsu-mo on the Ch’ieh-yun”, *BMFEA* 40 (1968), pp. 33-78.
- “On the Meaning of the Morpheme 嫌 Shyan in Pre-Han and Han Texts”,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九本下冊(1969年10月), 頁347-368.
- “Studies on the *Gongyang* 公羊 and *Guliang* 穀梁 Commentaries I.”, *BMFEA* 43(1971), pp. 67-222; II. *BMFEA* 47 (1975), pp. 19-69; III. *BMFEA* 49 (1977), pp. 33-215.
- “On Formal Criteria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Texts”. *A Symposium on Chinese Grammar*, Copenhagen 1972.
- “Six Poems on a Painting of Peonies”, *BMFEA* 44 (1972), pp. 75-91.
- “The Chiehyunn 切韻 Problem Re-examined”, Paper of the C. I. C. Far Eastern Language Institute 4 (1973).
- Literary Fragments from the Tang*, The Associa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Stockholm, Vol. 10, 1974.
- Die Religionen Chinas. Handbuch der Religionsgeschichte*, Göttingen, 1974.
- Xu Shen’s Postface to the Shuo Wen Jie Zi*, The Associa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Stockholm, Vol. 9, 1974.
- “The Lyrical Poetry of Shin Chihjyi(Hsin Ch’i-chi) 辛棄疾 1140-1207”, *BMFEA* 46 (1974), pp. 29-63.
- “Random Notes on a Santair 三台 Poem of the Tang Period”, *BMFEA* 47 (1975), pp. 71-92.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Social Context*, Nobel Symposium no. 32, Stockholm, 1977.
- Chinesische Religionen, in *TRE; Theologische Realenzyklopädie*, Vol. 5, Berlin, New York, 1977.
- “What did the Master Say?” [A study of the Morphemes Represented by the Graph 與 in the *Lunyu* 論語], in David T. Roy & Tsuen-hsuein Tsien

- (eds.), *Ancient China: Studies in Early Civilization*, Hong Kong, 1978.
- “Two Recent Studies on the *Gongyang* 公羊 *Commentary*”, *BMFEA* 50 (1978), pp. 181-197.
- “Strangely Fair, the Flowers on the Battle Field” [A Study of Mao Zedong’s Poetry], in *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Herbert Franke*, (edited by Wolfgang Bauer), Wiesbaden, 1979, pp. 363-369.
- “Blake in China”, *Blake: An Illustrated Quarterly* 13:1(1979), pp. 24-28.
- “On the Functions and Meanings of the Graph 其 in the *Tzuoojuann* 左傳”, in 《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Taipei, 1981, pp. 365-389.
- “Yang Jifu 楊吉甫: Poems”, *Renditions* 16 (1981), pp. 62-67.
- 〈關於古代漢語表達情態的幾種方式〉, 《中國語文》1981年第2期, 頁109-118.
- “O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istic Poetry in China”, *BMFEA* 55 (1983), pp.57-71.
- “Tomas Tranströmer, Poems from the Wild Square”, [translations of poems from Tomas Tranströmer’s collection *Det vilda torget*], *Swedish Book Review* 2 (1985), pp. 16-25.
- “Tomas Tranströmer, Six Winters” [translation of Tomas Tranströmer’s suite *Sex vintrar*], in *A Celebration for Stanley Kunitz on His 80th Birthday*, New York, 1986, pp. 68-69.
- “Hsin Ch’i-chi 辛棄疾”, in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ed.),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432-433.
- The Blue House* [translations of prose-poems by Tomas Tranströmer], Houston, 1987, 16 pages.
- “Tomas Tranströmer, Three Poems”, in *The Phoenix Review*, Canberra, 2 (1987/88), pp. 56-57.
- 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edited by N. G. D. Malmqvist), Leiden, New York, Copenhagen, Köln, Vol. I, The Novel (1988), Vol. II, The Short Story (1988), Vol. III, Poetry (1989), Vol. IV,

Drama (1989).

“On the Modalities of Obligation and Epistemic Necessity in the *Xiyouji* 西遊記”,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pei, 1989, pp. 505-518.

“La linguistica cinese” in Giulio C. Lepschy (ed.), *Storia della linguistica*, Bologna, 1990, pp. 29-50.

〈從大同書看中西烏托邦的差異〉，《二十一世紀》第5期（1990年6月），頁11-15。

“A Note on a Lyrical Poem by Li Qingzhao (1084-1151)”, *Archív Orientální* 59 (1991), pp. 190-193.

*The Frozen Torch* [translations of poems by 商禽], London, 1992.

〈論翻譯家的角色〉，《今天》1992年第1期（總16期），頁223-231。

“On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 in Sture Allén (ed.), *The Situation of High-Quality Literature*.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Swedish Academy Nobel Jubilee Symposium (December 5-8, 1991), Stockholm, 1993.

“Letters between Qin Jia and His Wife Xu Shu”, *Renditions* 41 & 42 (1994), pp. 1-3.

〈瑞典學院與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7卷第1期（1997年3月），頁1-8。

馬悅然教授以瑞典文所譯的中國文學作品（上古、中古與現代）共計有40種47冊。